

延安文艺丛书

秧歌剧卷

湖南文艺出版社

需要个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dacted]

湖南文艺丛书

第七卷

秧歌剧卷

藏书专用章

主　编：苏一平　陈　明
副主编：董维贤　刘庆锷
编　辑：魏树仁

湖南文艺出版社

延安文艺丛书
第七卷
秧歌剧卷
《延安文艺丛书》编委会编
责任编辑：高　彬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1987年10月新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20 插页：6 字数：479,000
印数：1—2,100
平装：ISBN 7—5404—0158—3/J·25
统一书号：10456·301　定价：5.25元
精装：ISBN 7—5404—0159—1/J·26
统一书号：10456·301　定价：6.40元

《延安文艺丛书》

编 辑 说 明

一、自从党中央率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延安开始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时期。在这一时期所产生的各种文学艺术作品，极其丰富多采。这些作品，都是当时的人们生活、学习、工作、劳动和战斗的真实生动的反映，它在团结人民战胜敌人方面，在丰富根据地和全国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方面，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是我国文化宝库中极其珍贵的精神财富。为了宣传贯彻党的文艺路线、方针、政策，继承延安时期文学艺术的光荣传统和革命精神，为加强对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和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学习，开展对延安文艺成果的研究，提供一套比较完整、比较系统的文艺作品选集和部分比较重要的文艺活动史料，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和繁荣，特编辑出版《延安文艺丛书》。

二、本丛书是一九八一年冬由湖南省出版局的主要负责同志和当年在延安从事文艺工作的老同志，共同倡议编辑的。经过积极酝酿与筹划，于一九八二年春提出了一个编辑出版计划要点（草案），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的支持，列为全国文艺学科重点科研项目之一。同时又广泛地得到文艺界老前辈的热情赞助，以及中国文学研究所和中国艺术研究院的鼎力协助。一九八二年五月中旬在北京，由延安时期文艺老战士召开的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四十周年的座谈会上，正式成立了《延安文艺丛书》编辑委员会，着手《丛书》的编辑工作。一九八三年秋，又得到

中共陕西省委领导的关怀与支持，并成立了专门工作小组，协助编委会的工作。

三、本丛书编选的时限是：从一九三六年党中央进驻陕北时起，至一九四八年春党中央转移华北后止。编选的范围是上述时间在延安及陕甘宁边区生活、学习与工作过的人，当年所写作、发表、演出、展览及出版的各种优秀文艺作品。选编的作品尽力做到具有较高的思想性与艺术性，能体现延安精神。

四、由于延安时期的文艺作品门类多，涉及面广，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将全套丛书编为十六卷，卷次如下：

（1）文艺理论卷；（2）小说卷（上）；（3）小说卷（下）；（4）散文卷（包括杂文）；（5）诗歌卷（包括古体诗词）；（6）报告文学卷；（7）秧歌剧卷；（8）歌剧卷；（9）话剧卷；（10）戏曲卷（包括平剧、地方剧）；（11）音乐卷；（12）美术卷（包括工艺美术、书法）；（13）电影、摄影卷；（14）舞蹈、曲艺、杂技卷；（15）民间文艺卷；（16）文艺史料卷。

丛书的内容丰富，篇目众多，品类复杂，各有特点，故各卷作品的编排次序，未作统一规定，根据各卷情况而定。

五、本丛书在编选的过程中，得到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中宣部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人民大学图书馆、首都图书馆、文化部文物局、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文学研究所、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央戏剧学院、中央美术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中国新闻电影制片厂、《新文学史料》编辑组、中国歌剧舞剧院、陕西省文化文物厅、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国杂技艺术家协会、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河北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西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延安大学、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博物馆、延安革命纪念馆、陕西省戏曲研究院以及陕西省歌舞剧院等单位的大

需要全本请到 www.ertongbook.com

力支持。湖南文艺出版社为出版这套丛书提供了条件，编辑同志也为此作出了努力，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六、从延安时期到现在，已过去近半个世纪。因时隔久远，几经战乱，作品散失不少。而留存的作品又分散各处，难以求全。希望通过这套丛书的出版，能继续搜集更多的作品和资料，以便再版时增补或续编。同时，由于时间、人力和水平所限，书中可能存在不少缺点和错误，我们热诚希望读者给予指正。

《延安文艺丛书》编辑委员会

一九八三年十月一日

总　序

丁　玲

最近有一位年轻作家同我谈到他的创作上的苦闷。他有生活基础，他的农村生活可以说很丰富。但是他感到自己创作的路子打不开，形式上不能创新，而且嫌自己的作品有些土气。另一位中年作家，四十年代就开始写作，他熟悉部队生活，也有长期农村生活的经历，写过不少好的作品，现在他谈到他在创作上的问题，也认为自己不易创新。对于应该遵循哪条道路、怎样继续往前走，他感到有些迷茫；他对自己原有的一套方法不满意，也嫌自己的土气。这些感触，是很值得大家思考的。这样的问题，目前可能不少人有同感，他们也正在踌躇、徘徊，有的人正在努力想在形式上突破自己惯用的手法，执意探索、追求和创新。我想这是好的，对的。一个创作工作者、一个作家应该经常努力尝试，使自己的作品能够达到更高的艺术水平，能更确切、完美地表达自己的思想，特别是要把自己的思想感情用极精致、极纯净的形式表现出来，给读者或观众留下清新、激情和永远向上的美好的遐想。这是我们每一个从事写作的人应该终身不倦地为之奋斗的。

我以为一件艺术品，固然需要美的形式，但更应有美的设想。文学作品表达的方面比较多，内容比较丰富复杂，更

需要有较高的思想情趣和完整的艺术形式，以及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形式可以影响内容，内容更能影响形式，新的内容很自然地会冲破一般的旧的形式。

现在一些同志要求创新，大多数看来都有点偏重于形式方面。他们对自己惯用的表现手法，也可以说是对我们大家在文学创作上惯用的手法感到不够用，感到需要有所创新。他们把原来的表现手法笼统地说是"土"。那么"土"的对立面自然是"洋"了。对此我们不能不先研究一下，弄清楚究竟什么叫"土"，什么叫"洋"？我们应该摒弃什么样的"土"，而追求什么样的"洋"。

我以为自"五四"以来，我们的新文学，大体上都是洋的，都是走的西洋的路子，都是受欧洲文艺复兴和十九世纪的欧洲文艺的影响。几十年来我们的美学理论、创作方法、什么自然主义、写实主义、象征主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以及什么现代派、抽象派、唯美派，……无一不是从洋搬来的。这并没有什么不好，但对于我们祖国，我们民族文学史上的一些宝贵遗产却注意得不够。我们中只有过很少一部分人提倡民族形式，要求继承我国的民族传统；也有很少的一部分人，提倡民间文学；这就是一般人所谓"土"的。但现在一些人所嫌弃的"土"，并非只限于民族民间文学，而是泛指一般的表现手法，即所谓现实主义文学。他们心目中的"洋"，则是指近代流行欧美各国的所谓现代派、意识流(实际也在慢慢过时)，不很讲究社会效果，超现实的纯粹艺术的文学形式等等。或者这样说都不够确切，这些同志是不喜欢曾拘束或损害过我们文学事业的教条主义，党八股；或者是"四人帮"时代的"假"、"大"、"空"；这些自然都是要不得的。但要反对教条主义、党八股，要反对"假"、"大"、

“空”，用什么来反对呢？是否就是追求形式上一些新奇或者把过去曾被革命人民和进步青年抛弃了的一些腐朽颓废的、脱离生活的靡靡之音，或者只讲究趣味、供有闲者茶余酒后、寻欢作乐的消遣品，还有那些描写无望的爱情、空虚的心灵、灰色的人生的诗歌，把这些当着高不可及的艺术精品加以模仿呢？创新是完全应该的。文学艺术一定不能墨守陈规，一定要推陈出新，一定要有新意。我认为作家只要不脱离生活，时时和群众一起斗争前进，建设新生活，写出来的作品饱含新意，自然就会有所提高。不管你的创作是用中国固有的民族形式，或是从外国拿来的形式，你的作品都会有所变化，都会更加丰富，都会有所创新。更简截地说，作家只有深入生活、深入群众、深入矛盾斗争，作家的思想感情、作家的人生观、世界观，作家对生活的剖析与感受，才能更敏锐、更正确、更深刻、才能够取得敢于和善于抒发这种职业的、近于天生的、充满诗意的本能。最重要的是到生活中去，到各种各样复杂的矛盾的斗争的生活中去，长期与人民在一道，从人民日常的生活中、德行中去体会去学习。这样再创作，“新”就会油然而生。作家如果永远停滞在一个水平上，无论思想或艺术，即使曾经达到过高水平的，也会由于时代的不断发展、前进，而作家却脱离了生活，高水平也会变为低水平，变为老一套，变为不受欢迎的了。

收集在延安文艺丛书里的这些作品，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少数英雄的天才创造出来的。这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文艺工作者与广大人民密切联系，从苏区文艺、红军文艺、以及“五四”以后新文艺与左联提倡的大众文艺等优良传统发展起来的。这一辉煌成就，当年从延安出发，曾经影响全解放区、大后方蒋管区，

为革命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伟大贡献，而且奠定了新中国建立以后文艺发展的基石。这些作品排斥了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思想影响，反对崇洋、崇大，反对关门提高，沿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正确道路，继承民族传统，运用戏曲、秧歌、小调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推陈出新，创造了许多成功的新戏曲、新秧歌、新音乐、新绘画木刻，以及饱含中国情趣的新诗、报告文学、短篇小说、长篇小说等，这是延安全体文学艺术工作者们不断学习、努力，从旧变新，土洋结合，从低到高才获得的伟大成就。

记得一九三六年冬天，我初到苏区陕北定边的时候，第一次见到了红军宣传队的表演，他们在乡村的土台上表演“红军舞”、“网球舞”、“生产舞”。战士和当地农民群众，都看得很有趣，觉得很新鲜。我想这应是属于“洋”的。因为其中很多是模仿苏联红军的，很多乐曲也是从苏联内战时期红军歌曲移植来的、但歌词是中国的，是歌唱中国革命的。此外还有许多山歌小调，经过文艺工作者的整理改编，歌词满含激情，曲调朴实优美，根据地的人民群众人人爱听爱唱，一种战斗的、乐观的、浪漫的热烈情趣，真使人心醉。这些歌曲，几乎人人都唱，根本没有谁去划分哪是“土”的，哪是“洋”的。那时延安部队、机关、团体都设有列宁室，后来改称救亡室、俱乐部，俱乐部里都办有墙报，上面载满了各种诗歌、散文、小小说等。中共中央宣传部和红军总政治部组织的史料征集委员会编辑的十余万字的《红军长征记》，其中有战士的作品，也有著名的红军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如张爱萍、陆定一、李一氓、傅钟、彭家伦、洪水、魏传统等的作品。这些作品有声有色，纪录了长征中的战斗、行军、英雄人物和战友之间的生死情谊，以及对长征途中民情风物

的描绘，都是充满激情的美丽的散文。其中有许多篇章，后来发表在一些刊物上，仍旧吸引着年轻的一代，帮助他们了解、学习和缅怀先辈们对革命事业的忠贞。这一史册的原稿现在收藏在上海鲁迅纪念馆里，这是值得庆幸的。

“七七事变”后，中央军委和中宣部组织西北战地服务团随军到山西前线工作。在筹备期间，西战团学习人民剧社等红军宣传团队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利用各种民间形式，旧瓶新酒，新瓶新酒，宣传党的团结抗战政策和争取抗战胜利的十大纲领。除了排练话剧、歌曲外，西战团设有杂耍组，组织团员学习采用大鼓、小调、相声、秧歌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创造了许多新颖节目，如京韵大鼓《大战平型关》在前方部队演唱时，每次都轰动全场，前方政治部还把它作为教材，印发给连队的每个战士。他们根据东北秧歌改编的《打倒日本升平舞》，虽然情节简单，故事性不强，但因为有了全民抗战的新内容，有根据人物身份而选择的舞姿，一九三八年春天在西安搬上舞台时，广大市民观众也为之耳目一新。这些形式都是旧的，也可以说是土的，但一旦经过改造、加工，得到了提高，便成了新的，使某些洋的也相形见绌。因为“洋”并不新，“洋”也有很旧的东西，不为群众所接受；“土”并不意味全是旧，只要能推陈出新，与人民生活相结合，与时代合拍，就成了新，就能为群众所喜爱。

后来，延安又涌来了更多的进步的文学艺术工作者，他们带来了大后方、大城市的一些中外闻名的文学艺术作品，对推动和提高延安文学艺术工作的水平，起了很好的作用。但与此同时，有些人就觉得延安原有的文艺太“土”了；有的人认为原来的都是宣传品，没有艺术性；有的人认为过去的那些节目只是豆芽菜；更多的人被从未见过的堂皇的布景、美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丽的服装、变化的灯光、曲折的情节、宏伟的场面所吸引。很多人对此欣赏欢迎，一些文艺工作者争相仿效，于是搞闭门造车，关门提高，厚古薄今，言必称希腊。有些文艺工作者感到迷茫，无所适从。有些人比较清醒，感到这些大、洋、古，虽也起了积极作用，但是脱离了人民群众中的大多数，没有反映人民当前的现实生活和要求，脱离了当前的政治形势，忽略了当前最重要的政治——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党中央发现了这个问题，及时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毛主席在会上发表了重要的讲话，提出文学艺术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方法问题、普及与提高的问题，宗派主义问题、学习马列主义等问题。讲话指出：人民的生活是文学艺术的源泉。毛主席代表党中央，号召文学艺术工作者到生活中去为广大的工农兵服务。文艺座谈会后，广大文艺工作者热烈愉快地参加整风学习，端正自己的立场，改进自己的工作，人人精神振奋，轻装上阵，深入工农兵，为争取抗战胜利，建立新中国而学习，创作。一段时间以后，新的木刻、密切结合群众、反映群众斗争的木刻在古元、彦涵等同志的刻刀下出现了。艾青写了对劳动模范的赞歌、李季写了《王贵与李香香》的新民歌，欧阳山等写了歌颂英雄、歌颂光明以及反映陕北新生活的报告文学。接着是短篇小说、中、长篇小说以及民间说书等都以抗日战争和曲折的阶级斗争为题材而陆续展现在读者面前。这时的秧歌经过专业的和业余的文艺工作者的团结合作，改造、提高，也从初级发展成为生动、活泼、新鲜的小歌剧。每当《兄妹开荒》、《牛永贵负伤》、《一朵红花》、《赵福贵自新》、《刘顺清开荒》等演出时，锣鼓一响，人们都从窑洞里涌出，冲下山坡，围满广场。陕北的冬天虽然很冷，但演出场上的热烈气氛，把人们的心都溶化了。那种场面永远留在演员和观众的

记忆里。那种亲切美好的享受将使人终生不忘。至于《血泪仇》、《白毛女》，更是当时广大农村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每次演出都是满村空巷，扶老携幼，屋顶上是人，墙头上是人，树杈上是人，草垛上是人。凄凉的情节，悲壮的音乐激动着全场的观众，有的泪流满面，有的掩面呜咽，一团一团的怒火压在胸间。这些从土到洋，既土又洋，从旧到新，真正是新的作品，代表了那一个伟大的时代，深受群众的欢迎拥护。把当时一些洋里洋气的作品自然比下去了。原来一些看不起"土"、倾心于"洋"的人，这时也开始认识到只有深入群众的斗争生活，才能在艺术上有所成就，有所创新；他们羡慕那些有深厚生活基础的作者和他们创作的反映了人民要求的作品。

现在是八十年代了，经历了十年动乱之后，在新形势下，一些年轻的文学艺术工作者在这个"土"与"洋"，"新"与"旧"的问题上又产生了迷茫。曾在土的基础上创新过的一些同志，也为某些"洋"吓住了，自己羞于与"洋"媲美。在这些同志的心目中，延安时代的文艺是早已过时、陈旧、落后，沦为"土"了；就是沿着延安道路发展壮大的五十年代的文艺，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也都成了过时的土产，不足以为范的了。但究竟从哪里去学"洋"、去创"新"呢？是否就是找一些在国外曾时兴过一阵、后来又被丢弃了的什么现代派、印象派、意识流、或者把三十年代被人们批评过的那些鸳鸯蝴蝶派、那些鄙视政治思想、只求趣味，实际也是从洋人那里运来的唯美派等等作为我们仿效的榜样呢？其实这些才都是旧的，在国外早就成了旧的。这自然不可能给我们的创作以新的血液，沿着这条路，才是一条真正的老路；走这样的老路，决不可能创新。这种"新"不合乎我们的国情，也不合

乎我们人民的需要。但是，如果我们只保持着延安文艺的水平，创作方法、内容、形式都没有新的突破，那也是不行的。时代前进了，社会上的各种矛盾和从前的都不一样了，人们的思想感情、文化水平都不一样了。我们文学的内涵、形式如果不能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前进，那就是停滞、保守、落后。客观变了，人们的认识不变，自然就不适应，所以我们应该大力创新。立意创新时，我们可以借鉴古人，做到“古为今用”；也可以借鉴西洋，做到“洋为中用”，象鲁迅先生曾说的，对外国好的，于我有用的东西，采取拿来主义。对外国的洋东西，我们不应一概排斥，也不能盲目轻信，要有分析，有选择，我们要拿来的只是在外国人民中也是经过考验，并且于我有益的东西。就象果木嫁接，植物杂交，都要经过反复筛选，而且必定要以适合本乡本土的气候、土壤等条件的母本为主，本固才能枝荣，嫁接、杂交才能成功，才能结出新果。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文学艺术工作者首先要自己解放自己。

近年来有的人提倡解放思想，博得了一些人的拥护。但我仔细观察，我怀疑其中有些人是不是又落进很不解放的网里了？他们画地为牢，把思想解放用绳子圈起来了。有的人虽以“新”为旗帜，但自己的一些言论又确是老生常谈，不合乎现代人的思想要求。有的人怕“土”求“新”，实际也成了一条枷锁。我希望作家能够解放自己，创作时不去计较是“土”是“洋”，是“新”是“旧”，只写自己所要写的。我以为没有固定的“土”，也没有固定的“新”。好的、美的、有时代感的，能引人向上的就是新；无聊的、虚幻的、生编硬造的，不管是从哪一个外国学来的都是陈旧的，都是“土”的。作家怎样才能解放自己？就是要完全、彻底去掉私心，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把自己看到的、体会到的一切社会现象，

摘其感人的，能使人爱、使人恨，使人思索的种种，尽情再现出来。作者的思想越深刻，描绘越细致，就能越有诗情画意，越能动人心弦。作家创作时只是追求精益求精，毫无个人打算，才能无所顾虑，舒展自由，无往不通，取得成就，真正创新，哪里还分什么"土"，什么"洋"呢！

我们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制定了开创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的战斗纲领，五届人大第五次会议颁布了新宪法和批准了第六个五年计划，非常鼓舞人心。去年，当年在延安从事文艺工作的同志们，集会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四十周年，决定成立《延安文艺丛书》编委会，组织全国各地的文学艺术工作者，分卷编选在延安和写延安的各种文艺代表作。负责编选的许多同志，不顾年老体弱，克服因长期战乱带来的材料散失的困难，和年轻人合作，短期内编选成册。湖南文艺出版社为保存这一宝贵的文学史料，慨然承担印刷出版的重任。编委会索序于我，我谨撰此文表示我对这一工作的支持，同时也再一次表示，和许多同志一样，我对延安文艺路线的拥护。我相信，在延安文艺获得的伟大成就的基础上，我们全体文学艺术工作者在四项基本原则的指导下，毫不动摇地继续坚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道路，坚持革命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坚持双百方针，不断地探索追求，我们必定能够创作出更多、更好、更为广大群众所喜爱的新的作品。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出新贡献。

一九八三年一月八日于云南西双版纳州

前　言

1937年党中央进驻延安之后，延安成为革命的圣地，指挥全国的中心。在这里，我们党开展了大规模的整风运动，掀起了轰轰烈烈大生产热潮，实行了大量的民主改革，对形形色色的敌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团结和吸引了全国的广大革命群众，推动了全民族的全面抗战和民主革命，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在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团结，把战争强加在人民头上的时候，又使解放战争在开始阶段就朝着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为摧毁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建立新中国奠定了稳固的基础。

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在文、武两条战线、文、武两支军队的配合作战下取得的。文化军队也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延安的文艺工作者，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有深入群众生活的良好条件，并受到时代精神的陶冶和感召，因而创造出大量的优秀和比较优秀的文艺作品。这些作品不仅具有革命的政治内容和深厚的生活气息，而且具有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虽然因为处在战争环境，许多作品来不及精雕细刻，但在当时仍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对后来的文艺创作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戏剧是当时延安文艺运动中最活跃、最广泛和最有影响的艺术部门之一。在文艺座谈会之前，继承江西中央苏区文艺运动的优良传统，在延安的戏剧工作者日益自觉地执行党

中央在新形势下提出要戏剧为抗日战争服务。在这个方针指导下，1936年，人民抗日剧社采用了民歌小调编写小型歌舞剧《上前线》、《亡国恨》等；1937年8月，西北战地服务团把民间流传的秧歌改作《打倒日本升平舞》，在广场和舞台演出，演员们分别化装成工、农、兵、学、商和日本侵略者、汉奸，宣传全国人民总动员，打倒日本侵略者和汉奸，唱的是新编抗战小调，舞蹈比较奔放、粗犷。这是利用民间喜闻乐见的旧形式而赋与革命内容改革尝试的第一步。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以鲁艺创作演出的《兄妹开荒》、《刘二起家》为先声，掀起了热火朝天的秧歌运动。据不完全统计，从1943年农历春节至1944年上半年，一年多的时间就创作并演出了三百多个秧歌剧，观众达八百万人次。

这一时期，延安创作和演出的秧歌剧有显著的特点：

第一，它广泛而真实地反映了边区内外的社会生活，从革命战争、生产劳动、反封建斗争到学习文化、改造后进、破除迷信等等方面，几乎都有所反映，而且反映的真实、生动、深刻。如《十二把镰刀》、《二媳妇纺线》、《栽树》、《送公粮》、《刘顺清》等。

建国以后，这批秧歌剧目有些在国外介绍上演，也获得国外观众的喜爱。如1949年中国青年艺术团出国参加第二届世界青年联欢节时，就曾演出过秧歌剧《牛永贵挂彩》，受到世界各国青年的热烈欢迎。

第二，塑造了一大批光彩夺目的工农兵形象，这些形象是时代的典型，群众的代表，仿效的榜样。他们有很高的阶级觉悟，饱满的政治热情，高尚的道德品质，闪烁着共产主义思想的光辉，是中国的戏剧舞台上感人的崭新的一代。1943年和1944年，在重庆演出了《牛永贵挂彩》、《兄妹开荒》和《一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